

迎澳门回归专辑

主编  
汤开建



# 历史文献 与 传统文化

LISHI WENXIAN YU CHUANTONG WENHUA



江西教育出版社

# 历史文献 与 传统文化

LISHI WENXIAN YU CHUANTONG WENHUA

迎澳门回归专辑

主编  
汤开建

江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迎澳门回归专集/汤开建主编.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11

ISBN 7-5392-3466-0

I. 历… II. 汤… III. ①文化史-研究-澳门②传统文化-研究-中国-南方地区 IV. K29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2511 号

**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

——迎澳门回归专集

第七集

LISHIWENXIAN YU CHUANTONGWENHUA

——YINGAOMENHUIGUI ZHUANJI

DIQIJI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编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URL: [http:// www.jxeph.com](http://www.jxeph.com)

(南昌市老贡院 8 号 330003)

南昌市印刷十一厂印刷

(南昌市文教路 94 号 330046)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1.25 印张

282 千字 印数 1-1245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92-3466-0/K·36 定价:16.9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调换

# 序 言

● 汤开建

1984年,陈乐素先生创办了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至今,已走过了整整十五个春秋。一个以古籍整理与传统文化研究为其生存手段的学术机构,在广州——这个中国南方最繁华的商业都市中居然站稳了脚跟,且日渐壮大。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究其原因,除了上级古委会、学校及学院领导的全力支持外,古籍所的历任领导与同仁坚持坚定的学术方向与端正、朴实的学风应是十分重要的原因。还有,因地制宜,结合暨南大学作为侨校的特点,拓展与广东地方特色紧密相关的岭南文化与港澳历史文化研究也应其中重要的原因。

经过十余年的磨炼与洗礼,古籍所已形成了一支人数不多但十分精干强悍的科研队伍,并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发展中三个颇具特色与实力的研究方向:宋元历史文化研究,港澳历史文化研究与岭南文化研究。不仅出版和发表一大批在海内外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著作和论文,而且已展开以中国古代史下半段为核心的高层次的硕士、博士两级教学工作,为国家输送高素质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人材。唐人孟浩然诗云:“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面对着在商业大潮中礼崩乐坏的传统,我们古籍所的全体同仁却沿着陈老开创的学术道路,秉承陈老的治学精神而坚持走到了今天,其间之不易,令人感慨万千。

暨南史学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而且曾拥有一大批享誉于海内外的著名教授,何炳松、周谷城、周予同、沈炼之、丁山、谭其骥、陈序经、陈乐素、金应熙、朱杰勤等,这些大师级的史学家为暨南大学带来了无数的荣誉,也为暨南大学培植了一个优良的传统。本所草创之初,乐素先生在治学上就反复强调严谨、求实的作风,他常以“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之言来严格要求所内每一位研究人员。因此,踏踏实实、不尚空谈已成为我所全体研究人员的基本学风。但是,时下的学术界世风日下,这种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几已丧失殆尽。为了眼前的短暂利益,为了一时的轰动效应,可以不顾其他。东拼西凑,粗制滥造,甚至鱼目混珠,抄袭剽窃,使假冒伪劣,文字垃圾大量涌现于学术市场。正如著名史学家章开沅先生言:“我们现在所缺少的,正是‘辨心术以议史德’的高度自觉,所以,敷衍塞职者有之,剽窃成书者有之,精品难出,庸著充塞,乃至在史学界也需要厉行打假扫劣”。官场的腐败、商场的腐败,必然引致学术界的腐败,而上述现象又正是学术界腐败的典型表现。对于这一切,任何一个稍有良心的学者无不痛心疾首。学术道德的沦丧,恐怕是一个民族彻底沉沦的最后标志,我们决不希望这一现象由典型而走向普遍。我们呼吁,正直的学者们联合起来,为捍卫学术的纯洁,每一个人都应该拿起批判的武器,直面学术的腐败。

本集以本所师生十余篇质朴无华的学术论文迎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迎接庆祝澳门回归祖国的盛大庆典,同时亦庆祝我们所建所十五周年之华诞。希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日



迎澳门回归专辑

LA

# 目 录

|          |     |
|----------|-----|
| 序 言..... | (1) |
|----------|-----|

## ● 港澳文化研究 ●

### 澳门开埠后第一份中文文献研究

|                          |             |
|--------------------------|-------------|
| ——庞尚鹏《抚处濠镜澳夷疏》初探.....    | 汤开建(1)      |
| 明季澳门—日本贸易的繁荣 .....       | 张廷茂(25)     |
| 清初澳门的海外贸易 .....          | 马宋芝(36)     |
| 粤海关澳门总口设立后对澳门贸易的管理 ..... | 王东峰(46)     |
| 论述香港南北行 .....            | 李龙潜 王钜科(66) |
| 明清时期香港地区的工商业及发展 .....    | 叶 农(97)     |

## ● 岭南文化研究 ●

|                                |              |
|--------------------------------|--------------|
| 牟子说略.....                      | 毛庆耆(130)     |
| 陈大震和他的《南海志》.....               | 邱树森 王 英(143) |
| 妈祖信仰与明代中外交通.....               | 刘月莲(152)     |
| 陈恭尹交游拾遗.....                   | 陆勇强(166)     |
| 岭南画派二高传论.....                  | 程国赋(200)     |
| 走出国门与晚清早期驻外公使的变革、开放意识<br>..... | 夏 泉(212)     |

## ● 传统文化研究 ●

|                       |          |
|-----------------------|----------|
| 爱国的、进步的思想家——魏源 .....  | 张 磊(231) |
| 略谈淮南王刘安的“无为而治” .....  | 辛 谷(245) |
| 浅谈曹植诗歌的抒情性 .....      | 陈应潮(256) |
| 清官楷模 廉政典范             |          |
| ——纪念包拯诞生一千周年 .....    | 张其凡(261) |
| 慷慨高昂的民族气节             |          |
| ——试论宋南渡词的主要特色 .....   | 姜小平(283) |
| 《元史·木华黎传》勘误 .....     | 修晓波(297) |
| 论《水浒传》的群体人物塑造 .....   | 杨芷华(306) |
| 关于《金瓶梅》婚姻描写研究 .....   | 吴溢球(324) |
| 略论武术古籍与武术文献学的建立 ..... | 马明达(337) |
| 后 记 .....             | (346)    |

## 澳门开埠后第一份中文文献研究

### ——庞尚鹏《抚处濠镜澳夷疏》初探

汤开建

在澳门历史上，第一个对澳门问题表示特殊关注且留下文字记录的中国人就是庞尚鹏，他留下的《抚处濠镜澳夷疏》亦是澳门开埠以后最早一份关于澳门问题详细报告的中文资料。庞尚鹏及其《抚处濠镜澳夷疏》也就成了我们研究澳门开埠初期史最值得注意的人物和文献。

庞尚鹏，字少南，广东南海人。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进士，历任江西乐平知县，监察御史，右佥都御史，后出任浙江、福建等地巡抚。庞氏生性介直，不畏权贵豪强，素以敢言著称。《明史·庞尚鹏传》称他：“慷慨任事，颇有经济之才，”“所至搏击豪强，吏民震慑。”<sup>①</sup>於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均有德政，故各地民众皆立生祠祀之。

庞尚鹏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中进士，在此之前，他一直在广东南海生活，而佛郎机夷人同其他东南亚各国商人从嘉靖八年以后，一直在广东香山澳地区活动，嘉靖十四年还直接开辟濠镜为番船贸易之地。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葡萄牙人入居澳门，<sup>②</sup>虽然此时他已离开广东。但不久又出任广东监察御史，直接调查了解广东地方政治、经济及军事等各方面情况。因此，

可以肯定，从他的出生和经历，就可知道，他应是一位对早期澳门问题最为熟悉和了解的明朝官员。

他出任监察御史之初，就对倭寇问题十分关注，并就此而上奏章呈报朝廷，到广东之後，他最关注的就是澳门问题，他亲眼看到，葡萄牙人入住澳门後，仅数年时间，一座荒岛已变成一“雄然巨镇”，已变成一繁荣商埠。外国人口越聚越多，而且军事实力越来越强，他感到了一种“隐忧”，出於士大夫对国家的责任感，在其离任广东，出任浙江巡抚时，将其在澳门所见，以及他对澳门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意见写成了一份奏章上报明廷，时间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冬。<sup>④</sup>奏章原题名为《陈末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疏》，又称《区画濠镜保安海隅疏》或《抚处濠镜澳夷疏》。

这篇奏疏曾在多处载录，首见於庞氏之《百可亭摘稿》，后又在郭邨《广东通志》、《明经世文编》、《天下郡国利病书》、《澳门记略》及刘廷元《南海县志》、多种《香山县志》相次转录，成为人们研究澳门史必须参阅的重要资料。这篇奏疏在各处载录，文字都有所不同，《百可亭摘稿》、《广东通志》、《天下郡国利病书》及《明经世文编》所录文字较详，《澳门记略》及《香山县志》所录则多有删削。

庞氏这篇关于澳门开埠初期的报告，是一份史料价值极高的澳门文献。正因为他认为当时的澳门问题已成为广东一省“祸切门庭”的头等大事，因此，他花了很大的功夫对澳门问题进行了实地调查，并详细报道了澳门开埠初期的真实情况，以及广东地方对澳门葡萄牙人的态度。文章不长，约一千一百餘字，但内容丰富。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全篇奏章进行一些探讨。

《抚处濠镜澳夷疏》是较早记录“濠镜澳”和最早记录“澳门”两种地名的中文文献。

托梅·皮雷斯 (Tomé Pires) 於 1515 年成书的《东方诸国记》中关于中国有一段这样的记载：

在广州港的那边还有一海港，叫 Oquem，从陆路而往需走三天，若取水路则一天一夜。此港是琉球人及其他民族的泊所。<sup>⑤</sup>

Oquem，穆尔 (A. C. Moulr) 教授认为即是 Foquem，应译为福建或福州，穆尔教授所依据的主要是 1603 年意大利旅行家卡尔莱蒂 (Francesco Carletei) 带回的一本《中国地图册》上将“福建”译为“Ochiamo。”<sup>⑥</sup>然而，根据上书介绍从广州至 Oquem 的行程来看，福州显然是不适合。从广州到福州在当时交通条件下，陆行三天，水行一日一夜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穆尔教授的解释应该是不能成立的。

根据皮雷斯书中提供的行程，再结合当时在广州附近出现港口，又与 Oquem 一词对音相近者，应当是“廉镜”了。黄佐《广东通志》卷六六载：

布政司案：查得递年暹罗国蠓该国管下甘蒲蠓、六坤洲与满刺加、顺搭、占城各国夷船，或湾泊新宁广海、望峒；或新会奇潭；香山浪白、蠓镜、十字门；或东莞鸡栖、屯门、虎头门等处海澳，湾泊不一。<sup>⑦</sup>

这是中文文献中第一次出现“廉镜”之名。黄佐将上述布政司文系於林富上疏通番舶之後。查《明实录》，林富上奏请通番舶在嘉靖八年 (1529 年) 冬十月，<sup>⑧</sup>则可知，“廉镜”一名正式出现於文献的在嘉靖八年左右。又见文中所言为“递年”所见，亦可

证，簾镜之名的出现已经是嘉靖八年之前的事了，则时间上与1515年成书的《东方诸国记》大致相合，从广州至簾镜陆行三天，水行一日一夜在当时交通条件下也基本相合。那麼，皮雷斯所言：“此港是琉球人及其他民族的泊所”是否相合呢？前引黄佐文已说及在嘉靖八年以前东南亚各国的夷船就已泊於“簾镜”，“递年”即可视为几年或十几年，亦可视为二十几年或更长，则可知，簾镜港很早就是“其他民族的泊所”。黄佐《广东通志》卷六六还载：

正统十年（1445年），按察副使章格巡视海道，时流求使臣蔡璇等率数人以方物买卖邻国，风漂至香山港，守备当以海寇，欲战之以功。格不可，为之辨，奏还其贖而遣之，番夷颂德。<sup>⑨</sup>

香山港，当即“香山澳”，则簾镜亦涵盖其中，正统时，琉球人即已接触簾镜，这里已经成为港口。郭邨《粤大记》卷三载：

（天顺二年七月）海贼严启盛寇香山、东莞等处。先是，启盛坐死囚漳州府，越狱，聚徒下海为患，……至是招引番舶至香山沙尾外洋。<sup>⑩</sup>

“沙尾”即今珠海湾仔一带，沙尾外洋即在簾镜近海处。严启盛为漳州人，所招引番舶很可能就是琉球番舶。在天顺二年（1458年）时，各种外商船只已在簾镜走私和贸易。成书於嘉靖二十六年的《香山县志》卷一载：

“九澳山，其民皆岛夷。”<sup>⑪</sup>

九澳山，即今路环岛，亦可称“沙尾”之外洋。“岛夷”，南洋海岛诸国之人可称为“岛夷”，琉球人更可称之为“岛夷”。簾镜一地其内涵并不仅指今澳门半岛，砲仔、路环诸岛亦应在其中。上述资料，均可证香山之港口“簾镜”在16世纪以前即曾是琉球和东南亚商船停泊和走私贸易的地方。由於停泊之所并非稳定，走私贸易亦是秘密进行，“簾镜”（Oquem）之名在海外商人中

有所传播，反倒不被中国官方所认识。故在嘉靖二十六年修《香山县志》时，有九澳山而无濠镜。

庞尚鹏疏章中是这样记述“濠镜”的：

窃惟广东一省，西北联络五岭，东南大海在焉，蛮夷杂居，禁纲疏阔，海倭山寇，出没扰攘，现有经略，臣不敢烦渎外，谨摘其祸切门庭者，著为论列，惟陛下试垂听焉。

广州南有香山县，地当濒海，由雍麦（陌）至濠镜澳，计一日之程。有山对峙如台，曰南北台，即澳门也。

这是文献中第一次出现“濠镜澳”一词，前言者均为“濠镜”。“澳者，舶口也”，<sup>⑫</sup>庞尚鹏第一次将“濠镜”一地称之为港口，表明这时的濠镜已正式开埠，成为了一座名符其实的对外贸易港口。庞文称由雍陌至濠镜为一日之程。雍陌在香山县东南八十里，濠镜澳距香县城一百四十里，雍陌距濠镜澳则有六十里，故称“计一日之程。”据申良翰《香山县志》：“由前山村而南二十里日濠镜澳，未至三里为关。”<sup>⑬</sup>则知，濠镜澳一地之北部起点在明代关闸以北三里之地，亦当即今日拱北海关处。

庞文中第一次出现“澳门”之名：“有山对峙如台，曰南北台，即澳门也。”值得注意的是，庞文中的“澳门”之概念为“濠镜澳”之属下一地。即庞文中的所谓澳门”，仅指两山对峙之间地段。这两座山又何指呢？一船应指今澳门半岛东、西望洋山。东望洋山即今澳门半岛北面的松山，西望洋山即今澳门半岛西南的主教山，这两山所夹之地段就是南湾与北湾相对的这一区间。屈大均而言：“澳有南台、北台，台者山也，以相对，故谓之澳门”。<sup>⑭</sup>埃雷迪亚（Manuel Godinho de Eredia）约於 1615—1622 年绘的澳门第一张平面图显示，当时被称为 Macao 的地方仅只指今澳门半岛中一小片地方，半岛的西南部及东北部均为中国官方控制地区。<sup>⑮</sup>此图与庞氏所言相合。因此，我们可以获知，澳门开埠前和开埠初期，虽然濠镜澳和澳门均是指一地的地名，

但其实际内涵是不同的。濠镜是一个大的地域概念，其地应北起今之拱北，南还包括砲仔、路环诸岛，而澳门却是是一个小的地域概念，仅指东、西望洋山之间南北二湾相对的一个区间。

澳门，最初只是一个很小的地名，其意当为“濠镜澳之门”。於地域很小，且未形成固定的地名，因此，在嘉靖年间成书的《广东通志》、《香山县志》均不见其名。可见，此名仅流传在当地老百姓的口耳之中，而庞尚鹏曾经过实地调查察访而获知。

## 二

庞文第一次报道了16世纪中叶葡萄牙商人在浪白外洋及澳门近海的贸易情况：

（澳门）外环大海，接於牂牁，曰石硤海，乃番夷市舶交易之所。往年夷人入贡，附至货物，照例抽盘，其馀蕃商私贲货物至者，守澳官验实申海道，闻於抚按衙门，始放入澳，侯委官封籍，抽十之二，乃听贸易。其通事多漳、泉、宁、绍及东莞、新会人为之，椎髻环耳，效蕃衣服声音。每年夏秋间，夷舶乘风而至，往止二三艘而止，近增至二十餘艘，或又倍焉。往年俱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洋，水土甚恶，难於久驻，守澳官权令搭蓬栖息，殆舶出洋即撤之。

庞文叙述时并未按时间顺序，这里先讲的是澳门近海贸易，后又补述浪白外洋贸易。我们先来看浪白外洋贸易。庞文云：“往年俱泊浪白等澳。”浪白澳贸易究竟始於何时。《澳门记略》：“（澳门）外有岛，广百余里，是为浪白濶，明初诸蕃互市於此。”<sup>⑥</sup>《澳门记略》称明初浪白澳（“濶”即澳）即已成为外商互市之处。屈大均《广东新语》：“香山故有澳，名曰浪白，广百餘里，诸番互市其中。”<sup>⑦</sup>胡宗宪《筹海图编》：“九星洋等处而西，浪白澳尤甚，乃番舶等候接济之处。”<sup>⑧</sup>郭尚宾《防澳防黎疏》：“查夷

入市易，原在浪白外洋，後当事许其移入濠镜。”<sup>⑩</sup>《皇明法传录三朝续纪》卷一三亦称：“自佛朗机猫眼儿挟货来，无处栖泊，暂借浪白互市，然犹海外也”。<sup>⑪</sup>《澳门记略》称明初浪白澳已开始成为外商贸易之处，目前尚未有其他资料旁证，但此地很早即已成为外商与中国民间走私之地应可信。同治《香山县志》卷四：

明正统间，佛郎机夷泊居浪白之南水村，欲成澳埠，后为有司所逐。<sup>⑫</sup>

正统年号为公元1436—1449年，这时葡萄牙人尚未远征东方诸国，故不可能进入浪白。疑此“正统”为“正德”之误。正德九年（1514年），即有葡萄牙商船到了中国东南沿海，到正德十二年（1517年）後，葡萄牙商人就一直在广州外海活动，故正德间有佛郎机夷“泊居浪白”是可以相信的。前引黄佐《广东通志》卷六六大约是嘉靖八年（1529年）之前若干年（原文为“递年”）浪白即已成为各国商船的“湾泊之所。”据张增信《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上）第二章305页公布的1537年的两张古典葡萄牙航海图上，在今日浪白澳之地，标写着Labupa或Labups，其音与“浪白”相近，可证，浪白澳在1537年以前即为葡萄牙商队熟悉和认识。

嘉靖初，上川岛的葡人遭明军袭击，很多葡人丧亡，但有少数人逃至浪白澳。<sup>⑬</sup>亦有人称，1542年时葡人被允许到浪白澳贸易。<sup>⑭</sup>但据西文资料，浪白澳真正成为葡萄牙人较为固定的贸易点应始於1549年。龙思泰（A. Ljungstedt）称：“1549年，有30位在漳州劫後餘生的葡萄牙人泛海欲至上川，结果在浪白登岸，後來便一直定居於此。”<sup>⑮</sup>1522年死於上川岛的耶稣会士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信札称：“杜阿爹”（Duarte da Gama）的船於1551年去日本途中经过浪白。”<sup>⑯</sup>到澳门开埠前之时，浪白澳已成为葡萄牙商人的一重要贸易据点。平托（M. Pinto）的

信则称。“（1555年8月3日）到了浪白澳，这里是船只贸易的地方。”<sup>②</sup>佛罗依斯（Luis Froes）神父於1555年12月15日在马六甲写的信亦称：“浪白澳有近400名葡萄牙人，5位弥撒神父。”<sup>③</sup>而且贸易数额不小，据巴列托神父的信称：“1555年时，浪白港有3万多担胡椒和从日本运来的10万克鲁扎多白银。”<sup>④</sup>直至澳门开埠後数年即1560年因避风浪而至浪白的耶稣会士加果（Baltezar Gago）还说，“在浪白约有500-600名葡萄牙商人持续居住。”<sup>⑤</sup>但葡商较大规模从浪白移至濠镜却始入1557年。博卡罗（A. Bocarro）《1635年的澳门》：“1555年（葡人）贸易移於浪白澳，1557年由此转移於澳门。”<sup>⑥</sup>

可证，庞氏所言之“往年俱泊於浪白等澳”正是反映澳门开埠之前，浪白澳已成为各国商人对中国进行贸易的重要地点。这里贸易点并非走私贸易，而是明王朝专门开设的，在澳中还设有“守澳官”。庞文中浪白澳的“守澳官”出现，即可证“守澳官”一职并非明朝在澳门设立的专门官职，我认为凡是经明朝允许有外商来进行贸易的海岛、海澳均有可能设立“守澳官”。《大清一统志》：“香山则有浪白、濠镜、十字门，皆置守澳官”。<sup>⑦</sup>庞文还称：“往年俱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洋，水土甚恶，难於久驻，守澳官权令搭蓬栖息，殆舶出即撤之。”这在佛罗依斯神父的信札中亦有记载：“浪白是个没有居民的沙岛，但葡萄牙人已在此搭蓬栖息，并存栈过冬。”<sup>⑧</sup>由於候季风的原故，浪白成为当时葡萄牙人从马六甲到日本贸易的中途站。明政府除在浪白派驻“守澳官”外，还驻有海道哨兵500名，配备大乌艚民船8艘，海道随捕快马船8艘，委指挥使1员统领<sup>⑨</sup>，可以反映，明王朝对浪白澳贸易的重视。

与浪白澳开澳贸易的同时，澳门近海贸易亦展开。庞文中记录的“石硤海”，当为《香山县志》中的“石岐海”。康熙《广东輿图》卷二：“石岐海，在城西北，源自顺德县界，……流第一

角海，至大小横琴，出十字门。”<sup>③</sup>则可证庞文称“石峡海”为濠镜澳“外环”之大海，则当是十字门海。十字门海在黄佐《广东通志》卷六六中即是同“浪白”一样为各国夷船“湾泊之所”。万历七年间绘制的《全广海图》中亦标明：“十字门澳，夷船泊澳。”<sup>④</sup>庞文又称“石碇海”“乃番夷市舶交易之所。”与十字门澳同时开放的还有“簾镜”，而十字门和簾镜均属今澳门地区。这应是说，澳门开埠以后，即1554年后。澳门近海已成为番夷市舶之所。但这一时期的贸易仅局限於海上贸易不允许外国商人上岸。正如王以宁所言：“秬载而来，市毕而去，从未有盘踞於澳门者。”<sup>⑤</sup>外国的贡船，则按往年规定“照例抽盘”。对于外商私人来做贸易者，则由“守澳官”检验查实，再申报海道副使和抚按衙门，然后允许船只进港。船进港后，“抽其十之二”作为商税，才允许外商自由贸易。澳门开埠之前，我们在浪白、十字门、簾镜等地的管理机构中仅见的管理官员为“守澳官”。守澳官不仅是管理海港正常秩序的官员，亦是负责徵收商税官员之一。据道光《香山县志》卷四：

浪白澳在澳门西迤南九十里，在黄梁都西南六十里。<sup>⑥</sup>  
即今珠海市南水镇南水村，两地距离甚远。我认为这里的“守澳官”应分别是“浪白澳”的“守澳官”和“十字门及簾镜澳”的“守澳官。”

正因为澳门近海成为“番夷市舶交易之所”，这就吸引了大批内地人到此经商贸易。庞文称：“其通事多漳、泉、宁、绍及东莞、新会人为之。”这些充当翻译的通事往往身兼两任，即当翻译又当商人。这些人来自浙、闽、粤三省海上贸易发达地区。《明史·佛郎机传》称，“闽粤商人，趋之若鹜”，亦当指此。这些翻译和商人均“椎髻环耳，效番衣服声音”，完全以外国人的形象出现。

据庞文载：“每年夏秋间，夷船乘风而至，往止二三艘而